

《宋实录》川蜀作者群初探

谢 贵 安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2)

摘要:在两宋有据可考的《宋实录》修纂官员 253 人次中,川蜀地区达 44 人次之多,居各地之首,约占全部人数的六分之一,反映了宋代川蜀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状态。南宋时期,由于中原的丧失和川蜀在国家版图中地位的突显,使川籍实录作者人数剧增,超过了号称人文渊薮的浙江和江苏。川蜀实录作者之众,与当地的史学家族及其所形成的史学传统有关,出现了纵贯南北两宋的成都华阳范家、南宋崛起的眉州丹棱李家和邛州蒲江高家。此外,眉州眉山的苏轼和隆州井研的李心传投身于实录修纂,也加重了川蜀实录作者的份量。

关键词:《宋实录》;作者群;蜀文化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4)01-0014-08

作为“天府之国”的川蜀^{①[1]卷二[2]卷一六〇}是中国文化在西部的“产区”,与东部的江浙遥相对应。川蜀所拥有的这一崇高地位,在史学上也有突出的显现。特别是两宋时期,川蜀籍史家大放异彩,撰成许多重要的史学著作,如成都华阳人范祖禹的《唐鉴》、成都人吴缜的《新唐书纠谬》、新津人张唐英的《唐史发潜》、眉州丹棱(眉山市丹棱县)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隆州井研(今属四川乐山市)人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两宋时,川蜀地区包括成都府路、梓州路(南宋改潼川府路)、利州路(南宋后期分为利州东路、利州西路)、夔州路等,虽然包含了今重庆市,但《宋实录》的作者却分布于阆州、成都(华阳、双流、新繁)、眉州(眉山、丹棱、青神)、蜀州(新津、崇州)、邛州(临邛、蒲江)、汉州绵竹、永康军青城县、顺庆(南充)、隆州(井研)等地,皆在今四川省境内。本文所论川蜀作者,便指今四川省的作者。虽然四川是今天通行的地理概念,但以四川盆地为主要地理单元所形成的特殊的生态环境,则并不受行政区划的变化而改变,其对史学人才孕育所赋予的自然条件是既定的,变化的只

是该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荣衰,进而影响到该地的人才增减以及这些人才对国家史学贡献的大小。目前,关于四川古代史家的研究,学界已有一定的成果^{②[3-6]},但据笔者目力所及,尚无专门研究《宋实录》作者群的论著,故本文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加以探讨。

一 国史《宋实录》与川蜀地方作者

《宋实录》是两宋朝廷组织修纂的官方史书,属于“国史”系统,反映的是以皇帝为核心的全国政事,属于编年附传体裁的当代史。《宋实录》的修纂和应用,关乎大宋王朝的“祖宗家法”和“祖宗规模”。宋高宗曾明确指出“令进累朝《实录》,盖欲尽见祖宗规模,此是朕家法,要得遵守!”^{[7]卷九《高宗九》[8]卷一八上《宋高宗五》}除宋末战乱时期外,宋廷自始至终都遵循祖制编修实录。正如洪迈所言“检照国朝典故,累圣祔庙之后,即诏国史院修纂《实录》。”^{[9]2789-2790}两宋共有 16 朝皇帝,北宋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九朝,南宋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恭帝七朝,除南宋度宗和恭帝外,均修有实录,共计 14 朝实

收稿日期:2013-06-20

作者简介:谢贵安(1962—),男,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录。其中《太祖实录》又修过4次,《神宗实录》先后修过6次,哲宗与徽宗《实录》各修过2次,高宗、孝宗、光宗《实录》也各修过2次。

作为国史的《宋实录》,其作者由朝廷选拔,来自宋代史馆、国史院、实录院以及其他馆阁机构,但例无专官,多为兼职,故不一定纂修到底,经常半途置换。可以说,《宋实录》的修纂者并非专意挑选,而具有某种程度的随意性。正是在这种随意中,川蜀籍作者较大规模地入选的事实,反映出川蜀籍作者较高的素质和四川地区文化发达的状态,是川蜀人才多的概率作用的结果。

与《清实录》修纂人员完备地附载于每部实录之前不同,《宋实录》的修纂人员连同实录本身都已散佚。只能依据考证,尽量弄清其作者情况。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宋代共进行了26次修纂,纂成14朝实录,有据可考的修纂官员共达253人次(由于有些人多次出纂不同的实录,故本文以人次来计算),其中川籍作者共44人次,约占1/6,即17.39%(详见表1)。

表1.《宋实录》修纂人员省籍概况表

省籍(今日)	人次	所占比例	所占平均数
四川	44	17.39%	1/6
浙江	40	15.81%	1/6
福建	34	13.44%	1/7
江西	29	11.46%	1/9
河南	26	10.28%	1/10
江苏	24	9.49%	1/11
河北	17	6.72%	1/15
山东	11	4.35%	1/23
安徽	10	3.95%	1/25
湖北	6	2.37%	1/42
山西	5	1.98%	1/51
广东	2	0.79%	1/127
陕西	1	0.40%	1/253
湖南	1	0.40%	1/253
未知籍贯(董淳、宗度、任守忠)	3	1.19%	1/84
总计	253	100%	

从表1可以看出,四川作者人数最多,占整个修纂人员的比例最大,反映了宋代川蜀地区文化发达的盛况以及在史学上所具有的实力。

二 川蜀作者修纂《宋实录》的阶段特征

川蜀史家对《宋实录》的修纂,并非一开始就占有优势,而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相比较而言,川蜀实录作者北宋时较少,只有9人次,南宋时达到极盛,多达35人次。大致而言,经历了从无到有到盛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北宋初川蜀籍作者的缺席

川蜀作者修纂《宋实录》并非一开始就具有优势。据最初所修的《太祖实录》的四次修纂与《太宗实录》的修纂共五次纂修中,都没有川蜀人的身影。《太祖实录》初修9人次,其中河北、河南籍各3人次,山东、江苏各1人次,未知籍贯1人次;二修4人次,其中河北3人次,江苏1人次;三修8人次,其中河北3人次,河南、山东各2人次,江苏1人次;四修6人次,其中河南、江西各2人次,山东、湖北各1人次。《宋太宗实录》的修纂有7人次,其中江苏2人次,河南、河北、山东、福建各1人次,未知籍贯1人次。在以上出场人员中,河北最多,达10人次;河南次之,达8人次;山东和江苏再次之,各达5人次;江西2人次;湖北、福建各1人次。可见,在北宋初期,参与实录修纂最多的作者还是中原地区,而川蜀竟无一人参与。直到宋仁宗继位后,开始修纂《真宗实录》时,川蜀人才正式登上实录修纂的舞台,并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为越来越重的修纂主力。

北宋初期川蜀尚未完全融入中原,加上王小波、李顺起义导致的川蜀与中原的疏离,似对这种局面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至道初,太宗认为“蜀民轻浮,好为游乐,官吏政宽,能与之浮沉,民即便安。若稍执纲纪,动即怨怼。”南宋时曹彦约读此,指出“祖宗时广南、川蜀向化未久,择平允识事体及政宽与之浮沉者治之,乃其宜也。”^{[10]卷四}说明宋初川蜀地区文化积淀尚浅。这对宋初川蜀史才的沉寂有明显的影

第二阶段:北宋中后期川蜀作者的出现与渐盛

仁宗乾兴元年(1022),川蜀作者趁修《真宗实录》之际,登上了实录修纂的舞台。虽然北宋川蜀作者只占两宋整个该地实录作者的20.45%,但毕竟实现了零的突破,并逐步增多。最先登上这个舞台的是阆州(今阆中市)陈尧佐。

乾兴元年十一月癸酉,朝廷命令翰林学士承旨李维、翰林学士晏殊修《真宗实录》,不久又命翰林侍讲学士孙奭、知制诰宋绶、度支副使陈尧佐同修^{[11]卷九九[8]卷六《宋真宗二》[12]卷三五}。与陈尧佐作同事且有据可考的共8人,前后两任监修冯拯和王钦若,一起从事实录修纂的有李维、晏殊、孙奭、宋绶、王举正和李淑。

陈尧佐字希元,是川蜀第一位修纂《宋实录》的作者。欧阳修在所撰《陈文惠公尧佐神道碑》中指出,陈尧佐“平生奏疏尤多”,但“悉焚其稿”,其他著作“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庐编》、《潮阳编》、《愚丘集》,多慕韩愈为文。与修《真宗实录》,又修《国史》”^[13]卷十五。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卷四介绍陈尧佐时称“陈尧佐,字希元,阆州人。端拱初进士,累迁三司副使。修《永定实录》(即《真宗实录》),擢知制诰,历韶、庐、寿、洛、并、同、雍、郑八州。景祐四年,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以太子太师致仕,年八十二卒。”当然,陈尧佐与修实录时,仍未能改变当时的中原主力格局,其同事中,河北籍有3人,江西有2人,河南、山东、江苏各1人。

到《仁宗实录》修纂时,川蜀的作者开始占有一定的优势。《仁宗实录》修纂者有据可稽的共11位,其中河南籍4人,排名第一,但此时的川蜀作者2人(王珪、范镇)与河北并列第二,福建、湖北各1人,反居其下,未知籍贯者1人。川蜀并非仅仅是人数上占有优势,而且在地位上也有表现。王珪是第一批任命的排名第一位的《仁宗实录》修纂官员,位列贾黯、范镇、宋敏求、吕夏卿、韩维之上^[11]卷一九九。嘉祐八年十二月庚辰。王珪,“字禹玉,成都华阳人”^[2]卷三一二《王珪传》。他排名《仁宗实录》作者的首位,地位自然比较特殊。当贾黯调台谏和宋敏求外贬时,都由王珪挑头上疏,出面挽留。范镇,《宋史》卷三三七有传,称“字景仁,成都华阳人”,与王珪是老乡,修纂中应该有所配合。

王珪将他的地位延伸至《英宗实录》的修纂中。《英宗实录》修纂者有据可稽的共9位,其中提举1位,编撰官员7位,刊定1位,刊定者便是王珪。

北宋晚期,川蜀籍作者逐渐增多。哲宗元祐元年第一次修纂《神宗实录》时,参加修纂的史官有据可考的共有19人,其中川籍作者有2名,即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和著名的史学家范祖禹。虽然川籍修纂者人数不占优势,但二人都十分知名。苏轼在元祐二年任翰林院学士兼侍读时预修《神宗实录》。范祖禹是元祐元年闰二月丙申被任命为实录检讨的“著作佐郎范祖禹为《实录》院检讨官。”^[11]卷三六八。元祐元年闰二月丙申。范祖禹本来被任命为右正言,但当时吕公著为左丞,“祖禹以婿嫌改著作佐郎,为实录院检讨官,迁著作郎兼侍讲”,后“迁右谏议大夫,兼实录院修撰”,在绍圣遭到弹劾,“言者论祖禹所修《实录》以为诋斥先帝”,而一贬再贬^[14]卷七七《范祖禹传》。

绍圣间,二修《神宗实录》,对元祐本进行否定,故

此前立场倾向旧党的川蜀籍作者及其门徒们全军覆没,无一人入选。

不过,徽宗时初修《哲宗实录》时,19位新党作者中,仍有3位川籍作者。邓洵武是成都双流人,字子常,在初修《哲宗实录》时,他的地位比较重要。他是以中书舍人、给事中兼侍讲修撰《哲宗实录》的。据《宋史》卷三二九《邓綰子洵武传》载“洵武,字子常,第进士,为汝阳簿。”绍圣中,担任过国史院编修官,撰《神宗正史》,“议论专右蔡卞,诋诬宣仁后尤切。史祸之作,其力居多”;徽宗初,改秘书少监,“既而用蔡京荐复史职……进洵武中书舍人,给事中兼侍讲,修撰《哲宗实录》,迁吏部侍郎”^[2]卷三二九。除邓洵武外,张商英也是川蜀作者,是蜀州新津人。哲宗亲政后,“商英积憾元祐大臣不用己,极力攻之”,但崇宁时却与蔡京议政不合,被“罢知亳州,入元祐党籍”;大观四年,除中书侍郎,拜尚书右仆射,他为政持平,劝徽宗节,为何执中等所排挤,后官复原职;宣和三年卒,终年79岁^[2]卷三五《张商英传》。另一位川蜀作者是蹇序辰。据载:“崇宁元年九月癸卯,翰林学士蹇序辰兼修国史、实录修撰、讲议详定官。”^[15]卷一三二《徽宗皇帝·讲议司》。他是刑部侍郎蹇周辅之子,也是成都双流人,为邓洵武的老乡,看来同入实录院修史,并非偶然。绍圣中,提议将元祐旧党的言论,“选官编类,入为一帙”,促成元祐党禁;蔡京为相后,复拜刑部、礼部侍郎,为翰林学士,进承旨,后黜知汝州、苏州,移永州安置。

第三阶段:南宋川蜀籍作者群的崛起与鼎盛

南宋时,北方中原地区沦陷,川蜀在全国中的地位骤增,文化繁盛,人才众多,在实录修纂中占有更大的优势。南宋前期,川蜀籍作者群崛起,修纂人数达到鼎盛,占两宋整个川蜀实录作者的79.55%。

绍兴时,重修了北宋神、哲、徽、钦四朝的实录。四修本《神宗实录》始修于绍兴四年五月,完成于绍兴六年正月,参加修纂的史官有据可考的共有17人,其中三位川籍作者:范冲、任申先和常同。四修是对绍圣本实录的否定,故旧党后裔占据上风。范祖禹之子范冲担任直史馆,是实际的四修本《神宗实录》修纂的负责人。绍兴四年夏四月,以范冲直史馆,重修神宗、哲宗《实录》。“冲父祖禹,元祐中尝修《神宗实录》,尽书王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其后安石婿蔡卞恶之,祖禹坐谪死岭表。至是复以命冲”,高宗对他说“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故以属卿。”范冲于是“论熙宁创置,元祐复古,绍圣以降,弛张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又极言王安石变法度之非,蔡京误国之

罪”^[2]卷四三五《儒林列传五》。

另一位直史馆是任申先,字德初,眉州眉山人,是率先弹劾章惇的左正言任伯雨,次因任伯雨遭新党蔡卞等人的迫害而受到牵连,“用匿名书复逮其仲子申先赴狱”,但“申先在狱,锻炼无所傅致,乃得释”^[2]卷三四五《任伯雨传》。据陈騵《南宋馆阁录》卷八《官联下》,知任申先绍兴五年七月以起居舍人兼直史馆,与修《神宗实录》。

修撰官常同,字子正,是邛州临邛人,故监察御史常安民之子。绍兴四年,“除起居郎、中书舍人、史馆修撰”,上疏论神、哲二史云“绍圣时,则章惇取王安石《日录》私书改修《神宗实录》;在崇宁后,则蔡京尽焚毁《时政记》、《日历》,以私意修定《哲宗实录》”,认为“不可信于后世”,高宗“深嘉纳”,乃命常同担任修撰^[2]卷三七六《常同传》。

然而,在四修后,《神宗实录》又进行了第五次修纂,发动者是川蜀人张浚。他在赵鼎罢相后,从绍兴六年十二月至七年九月独任宰相,于七年六月六日正式推动了对《神宗实录》的第五次修纂,试图否定赵鼎的四修本。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人,进士及第,高宗初立,升为礼部侍郎,后任知枢密院事,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绍兴五年出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六年十二月代替赵鼎担任《神宗实录》监修,推动实录的改修。

最为配合张浚改修的,是他的老乡著作郎何抡,“初,《神宗实录》已成书矣,至是,乃用著作郎永康何抡刊正讹谬”^[16]卷二一 绍兴七年五月乙丑。何抡,字抡仲,永康军青城县人,也是进士出身。绍兴五年,因“张浚所引”,何抡从左宣教郎升为秘书郎^[17]卷八五 绍兴五年二月庚子。七年,时任著作郎的何抡,在宰相张浚的支持下,提出刊正四修本《神宗实录》的讹谬,并积极从事刊修工作,用签贴和涂抹的形式,改正前修实录的错误^[18]卷七《官联上》。然而,五修本《神宗实录》因张浚被贬,“抡不自安,遂撤去前日签贴焚之”^[17]卷一一一 绍兴八年八月壬午,被迫终止。

《神宗实录》的第六次修纂,是在绍兴七年十月,赵鼎复相后进行的,是对五修的否定,对四修的回归;任用的人员,多是张浚执政时遭到打击的史官,故六修时,无一川蜀人。

重修本《哲宗实录》始修于宋高宗绍兴四年五月,成书于绍兴八年九月。参加修纂的史官有据可考的共有16人,其中川蜀籍作者便有5人,约占三分之一。张浚一度担任《哲宗实录》重修的监修。赵鼎罢相后,张浚独任宰相直至绍兴七年九月。据李心传《建炎以

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七载,绍兴六年十二月辛酉(二十八日)，“张浚监修国史”。《哲宗实录》此时仍在修纂之中,因此张浚除任五修《神宗实录》监修外,必为《哲宗实录》监修。除了张浚外,还有一位与其意见不合的川蜀作者范冲。在重修《哲宗实录》之初,赵鼎是行政负责人,而具体的业务负责人当首推范冲。范冲代表元祐党人后裔的立场,对旧党子孙很是照顾,“司马光家属皆依冲所,冲抚育之”^[19]卷五四四《儒林传》。与范冲配合的另一位川蜀作者是前面提到过的常同。然而,与四修《神宗实录》时不同,此时重修《哲宗实录》,出现了其他的川蜀作者,史馆修撰勾涛即是其一。《宋史》卷三八二传云“勾涛,字景山,成都新繁人。登崇宁二年进士第”,绍兴八年,“除史馆修撰,重修《哲宗实录》”,“六月,《实录》成,进一秩,就馆赐宴”^[2]卷三八二《勾涛传》。参与《哲宗实录》重修的秘书少监苏符,也是川蜀眉山人,他因为“元祐政事屡致分更”,提出“非符所宜参预”,想打退堂鼓,高宗乃令其修纂《日历》^[17]卷一一一 绍兴七年五月癸巳,因此修成后的名单中便没有他的名字。

《徽宗实录》初修始于绍兴七年闰十月,终于绍兴二十八年十一月,长达21年。据现有史料考知,实际参加修纂的史官共有18人,其中川籍作者2名。其一便是成都华阳人范冲,担任直史馆,在《徽宗实录》初期修纂工作中主领其事。“高宗南渡……预修《徽宗实录》。方是时,范冲领史局,翌以文辞进,删润功居多”^[20]卷四《人物考·朱翌》。高宗曾指出“朕向尝论范冲修《徽宗实录》,惟当记政事之大可为法者,其细事自不必书。大抵史官须有经学,乃可用也。”^[16]卷三一 绍兴十三年夏四月辛巳。高宗提出修纂原则,面对的是范冲,这足以表明范冲在当时史馆中的特殊地位。另一位修撰官勾涛是成都新繁人。据《续通志》卷三八二本传载,绍兴间,“复修《徽宗实录》,涛以中书舍人吕本中荐,丞相赵鼎谕旨宜婉辞纪载”,但勾涛回答说“崇宁大观,大臣误国,以稔今祸,藉有隐讳,如天下野史何?”^[19]卷三八二

重修《徽宗实录》从孝宗乾道六年十二月始,至淳熙四年三月完工。有据可考的川籍作者有2人,其一是眉州丹棱人、修撰官李焘,其二是其子检讨官李塈。

《钦宗实录》的修纂人员多失载,今有据可稽的作者中无一人为川蜀籍,这在南宋实录修纂中是不多见的现象。

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修《高宗实录》,迄光、宁、理宗始完竣,前后修纂者约12人,其中川蜀人有3名,

占四分之一。继张浚后,川蜀人胡晋臣再次负责实录院的全面工作。张浚是实录院的监修,而胡晋臣是实录院的提举(相当于监修)。据《宋会要辑稿》载:绍熙元年“十二月十三日,诏参知政事胡晋臣提举实录院”。胡晋臣,字子远,蜀州(今四川崇州)人。担任具体修纂工作的也有川蜀人。杨大全是《高宗实录》的检讨官,字浑甫,眉州青神人,乾道八年进士;庆元元年,“修《高宗实录》,充检讨官”,先是韩侂胄专权,笼络杨大全,“大全笑谢,决不往。明日遂丐外。时《实录》将上矣,上必推恩。大全去不少待”,是一位正直的史官^[2]卷四〇〇《杨大全传》。理宗时,朝廷有意重修《高宗实录》,著名的史学家李心传便是改修《高宗实录》的修纂者之一。

《孝宗实录》与《光宗实录》的初修大约是一起进行的,作者基本相同,均是7人,其中川蜀作者都是一人,他就是眉州丹棱人李壁,字季章。其父是著名史学家李焘,有家学渊源,故傅伯寿特地推荐他接替自己修纂《孝宗实录》,但随着李壁地位的不断攀升,“不复领史事矣”^[2]卷三九八《李壁传》。

虽然上述二实录初修时,川籍作者只有一人,但《孝宗实录》和《光宗实录》同时重修时,川籍作者却达到鼎盛。据考,前后与修者共13人,川蜀人有魏了翁、李埴、游似、李心传、高斯得、高定子,竟然多达6人,几乎占了一半。邛州蒲江人魏了翁以兵部郎中、太常少卿、秘书监兼实录院检讨,居此职长达二年之久,曾上《论实录缺文疏》,提出改修的措施;理宗端平二年七月,魏了翁又以权礼部尚书兼任实录院的同修撰。眉州丹棱人李埴和游似是端平间孝、光两朝《实录》的同修撰。理宗端平元年八月,李埴以权刑部尚书兼实录院同修撰;三年九月,游似以礼部侍郎兼实录院同修撰^[21]卷九《官联三·实录院同修撰》。游似后又升为实录院修撰,为此他上疏请辞,但皇帝下诏《朝议大夫新除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游似辞免升兼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恩命不允诏》指出“纂修史籍,由同而正,盖彝典也。卿学该百氏,才擅三长,论撰逾年,善于其职。晋升一级,以示宠褒。胡执谦冲,谓难冒处。能于前而不能于后,岂有是哉?毋弃尔成,亟祇朕命,所辞宜不允。”^[22]卷二从中可见,游似是真正从事过实录修纂,超过一年,而且做得很好,既然“能于前”,就一定“能于后”,所以降诏慰留。隆州井研人李心传、邛州蒲江人高斯得、高定子叔侄均与修。重修光、孝两朝《实录》时,是史学“川军”最盛的时期。

南宋最后两朝实录《宁宗实录》和《理宗实录》修

纂时,川蜀作者仍然占有较大的比例。《宁宗实录》始修于理宗嘉熙二年(1238)三月己未,并分4次进呈,景定四年(1263)六月庚午最后由贾似道进呈。在这漫长的25年时间里,根据现有史料,共有15人参与了《宁宗实录》修纂。真正参与实录修纂的是李心传、高定子、高斯得、黄震、张显、赵汝腾、袁甫等人,其中李心传、高定子和高斯得三人为川蜀籍作者,占全部作者的五分之一。《理宗实录》的修纂人员,多不可考,据现有史料,能够考证出3人。修纂过孝宗、宁宗等实录的高斯得,无疑是《理宗实录》的修纂者,故川籍作者占三分之一。

三 修纂《宋实录》的川籍史学家族和名家

川蜀作者之所以在国史《宋实录》修纂中独领风骚,与川蜀的文化教育渐趋发达有关,更与这种文化养成的史学家族的兴起有关。在《宋实录》的修纂中,仅川蜀的几大史学家族的出现,就使实录修纂中川籍作者成员大增,占有绝对的优势。两宋时期,在实录修纂领域,川蜀形成了三大史学家族,分别是成都华阳范家、眉州丹棱李家和邛州蒲江高家。

1. 成都华阳范家

成都华阳范家,史学人才辈出。这个家族是一个历久不衰、纵贯南北两宋的史学世家,出现了好几位《宋实录》的修纂人员,为宋代史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范家第一代实录修纂官员的是范镇,字景仁,“其学本《六经》”,却在史学上也成就了一番事业。范镇举进士后,先后任馆阁校勘、直秘阁、起居舍人、集贤殿修撰和同修起居注、翰林学士等与文化相关的官职^[2]卷三三七《范镇传》。在担任翰林学士的时候,他参与修纂了《宋仁宗实录》。据《资治通鉴后编》载:嘉祐八年十二月庚辰,“命翰林学士王珪、贾黯、范镇撰《仁宗实录》”^[12]卷七一《宋纪·仁宗》。

范镇的侄孙(从孙)范祖禹是成都华阳范家第二代实录修纂专家,字淳甫,一字梦得,从小失去父亲,“叔祖镇抚育如己子”,可以说受到范镇的深刻影响,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范祖禹中进士甲科后,并没有立即入仕做官,而是“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在修纂《资治通鉴》的过程中,范祖禹还撰写了《唐鉴》十二卷,“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为“唐鉴公”。范祖禹的史学才华受到司马光的赞赏,称自己“纂次淹久,致其沉论”,而范祖禹则能“安恬静默,若将终身者”^[14]卷七七《范祖禹传》。哲宗时,范祖禹“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实录》检讨,迁著作

郎兼侍讲”^[2]卷三三七《范镇从子百禄从孙祖禹传》。他担任检讨是在元祐元年闰二月丙申,“著作佐郎范祖禹为《实录》院检讨官”^[11]卷三六八《哲宗元祐元年闰二月丙申》,后兼国史院修撰。绍述时期,“言者论祖禹修《实录》诋诬”,连贬偏远之地^[2]卷三三七《范镇从子百禄从孙祖禹传》。

范祖禹的儿子范冲,字元长,是成都华阳范氏家族的第三代实录修纂专家,登绍圣进士第。南宋绍兴四年,“亟诏重修神、哲两朝《实录》,召冲为宗正少卿兼直史馆。冲父祖禹,元祐中尝修《神宗实录》,尽书王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其后安石婿蔡卞恶之,祖禹坐谪死岭表。至是复以命冲”^[2]卷四三五《儒林列传五·范冲传》。另据《宋史》卷二七《高宗纪四》载:“(绍兴四年)五月……癸丑(四日)以范冲为宗正少卿兼直史馆,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实录》。”高宗对他说“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故以属卿。”范冲修《神宗实录》,“为《考异》一书,明示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者以朱书,世号‘朱墨史’”^[2]卷四三五《儒林列传五·范冲传》,后改任实录修撰,迁起居郎,改翰林侍读学士,终年75岁。

成都华阳范氏家族还有一个姻亲,也是实录修纂的重要官员。他就是范祖禹的岳父吕公著,是元祐初继司马光之后的《神宗实录》提举官^[2]卷三三六《吕公著传》。

如果说成都华阳范氏家族纵贯两宋的话,那么眉州丹棱家族则是南宋崛起的新兴史学世家。

2. 眉州丹棱李焘家族

南宋时,眉州丹棱李氏家族崛起,形成著名的史学世家,出现了李焘及其子李廌、李壁和李埴一门四杰的盛况。

李焘不仅是著名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而且还是《徽宗实录》的修纂者。李焘,字仁甫,绍兴八年,擢进士第,调华阳县,“博极载籍,搜罗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核”,又撰成《续资治通鉴长编》,为纂修《徽宗实录》奠定了史学基础;乾道五年,“迁秘书少监兼权起居舍人,寻兼实录院检讨官”;淳熙改元,进秘阁修撰、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当时“《徽宗实录》置院已久,趣上奏篇”,李焘推荐吕祖谦为秘书郎兼检讨官参与修纂,他自己也升为敷文阁直学士,兼侍讲、同修国史,在重修《徽宗实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卷三八八《李焘传》,实际上是重修《徽宗实录》的业务负责人。正因为如此,《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便径称“《徽宗实录》二百卷,李焘重修”。

李焘的长子李廌也参与了《徽宗实录》的修纂,“既中制科,为秘书省正字,寻迁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编修检讨官。父子同主史事,搢绅荣之”^[2]卷三八八《李焘传》。

李廌早于其父而亡,但父子同修《徽宗实录》一事,却载于史册。

除了这位早亡的长子李廌外,李焘还有两个儿子也参与了实录的修纂。其一是四子李壁,参与了《孝宗实录》和《光宗实录》的初修。当时,朝廷任命傅伯寿和陆游修纂二书,但两人年纪太大,只得各举一人代替自己。据《两朝纲目备要》卷七载“陆荐京西转运判官李大异,傅荐新除夔州路提点刑狱李壁。”李壁在修实录时,升迁太骤,“为秘书少监,迁宗正少卿、直舍人院,以至执政,不复领史事矣”。其二是五子李埴,在端平元年八月,以权刑部尚书兼实录院同修撰,参与了正在进行的《孝宗实录》和《光宗实录》的编纂^[21]卷九《官联三·实录院同修撰》。兄弟俩可以说是接力从事孝、光两朝实录的初修和再修。

3. 邛州蒲江高氏家族

稍后于丹棱李氏崛起的是邛州蒲江高氏。高家也是南宋时实录修纂的著名史学世家,叔父高定子和侄子高斯得都是南宋实录的修纂者。前者修纂了《孝宗实录》,后者于理宗时与修了《孝宗实录》的重修本。

高定子,字瞻叔,嘉泰二年举进士,后迁太常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起居舍人,后改翰林院侍讲、权礼部尚书,升兼侍读和直学士,曾因修孝宗、宁宗《日历》之功,“擢拜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吏部尚书,升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赐衣带、鞍马”;在理宗时“领史事”,做过实录院修撰,参与了《孝宗实录》的修纂工作^[2]卷四〇九《高定子传》。高定子对其侄高斯得的史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高斯得,字不妄,拥有很好的修史基础,除受叔父影响外,还修过国史、会要和要录,担任过侍立起居注。绍定四年,李心传以著作佐郎领史事,“即成都修《国朝会要》”时,征辟高斯得为检阅文字,曾“分修光、宁二帝《纪》”,寻迁史馆校勘,“时斯得叔父定子以礼部尚书领史事,时人以为美谈”,后因直言为人所陷,乃杜门不出;度宗即位,召为秘书监,“擢起居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侍讲”,兼权工部侍郎,“遂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仍兼侍讲”^[2]卷四〇九《高斯得传》。另据《南宋馆阁续录》卷七《官联一·少监》载“高斯得(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五月,以礼部郎官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除(少监),兼职依旧。当月兼直史馆,七月时暂兼权侍立修注官。”也就是在他担任实录院检讨和同修撰时期,《孝宗实录》正在修纂,直到景定二年(1261)该实录才宣告完成。高斯得还参与《宁宗实录》的修纂,最重要的证据是他在所著

的《耻堂存稿》卷五《书事》中说“比年,《宁录》登进之时,秀岩与予先后去国”,“不知后来秉笔者果能搜罗”那些直言强谏的奏书否?话中透露自己曾与修《宁宗实录》,但当《宁宗实录》大功告成时,他与秀岩(即李心传)都已离职。

4. 其他史学家

除了史学家族在修纂《宋实录》时十分突出外,川蜀地区的名家参与《宋实录》的修纂也令人瞩目。宋代时,川蜀地区史才纷出,在《宋实录》的修纂中,也出现了许多史学名家的身影。如前面提到的《唐鉴》和《资治通鉴》作者范祖禹,《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名家投身于《宋实录》的修纂,如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作者李心传等。

苏轼在《神宗实录》修纂中有较大的贡献。《宋史》本传载: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少时由母亲程氏亲授以书,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嘉祐二年,参加礼部会试,为主考官欧阳修赏识。他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元祐元年,任翰林学士,二年兼侍读,四年因论事为当权者所恨,苏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哲宗亲政后,再遭贬斥。他是在元祐二年任翰林院学士兼侍读时与修《神宗实录》的。

李心传(1166—1243),字微之,隆州井研人,理宗时,朝廷有意重修《高宗实录》,李心传便是改修《高宗实录》的修纂者之一。与此同时,他还参与改修了《孝宗实录》、《光宗实录》和《宁宗实录》。理宗宝庆四年(1231),即担任实录院检讨官。嘉熙二年(1238)三月己未,“以著作郎兼权工部郎官李心传为秘书少监、史馆修撰,专一修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国史》、《实录》”^[8]卷三三《宋理宗三》。又《宋史》卷四十二《理宗纪

二》载:嘉熙二年三月壬子,“以李心传为秘书少监、史馆修撰,修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国史》、《实录》”。

苏轼和李心传等人的加盟,增加了《宋实录》中川蜀修纂者的份量。他们与上述史学家族和其他川蜀籍实录修纂者一起,促成了川蜀史家在国史修纂中的优势地位,反映出两宋时期川蜀地区史学人才之盛和成就之大,并在若干领域超越其他地区。

总之,宋代川蜀地区《宋实录》修纂人员居各省(以今天行政区划为准)之首,约占全部人数的六分之一,反映了宋代川蜀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在南宋时期,由于中原地区的丧失,川蜀在国家版图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川籍实录修纂者人数剧增,在所有各省的与修人员中占有优势地位,超过了号称人文渊藪的浙江和江苏。川蜀《宋实录》作者之众,与当地史学家族及其所形成的史学传统有关,出现了纵贯南北两宋的成都华阳范家、南宋崛起的眉州丹棱李家和邛州蒲江高家。与此同时,宋代实录修纂中还出现了一些名家和大家,如眉州眉山的苏轼和隆州井研的李心传,成为南宋历史的耀眼明星,加重了两宋时川蜀实录修纂者的份量。尽管地理环境并非决定文化和史学的唯一因素,但同一环境内会造成相互间的攀比和彼此的感染,导致某种文化氛围的形成,从而影响该地区人的素质和行为取向。在川蜀作者中,政治立场一般倾向于王安石变法中的稳健和保守派“旧党”(如范祖禹、苏轼等),这不仅与作者自身的政治取向有关,而且也深受南宋政局的影响。南宋建立后,朝廷清理新党及其史学,有意任命旧党后裔(如川蜀史官范冲等)对神、哲、徽、钦实录或修改,或新修,对川蜀作者比例的加大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注释:

- ①“川蜀”是宋代四川的俗称。南宋程秘在《洛水集》卷二《奏疏·丙子轮对札子》中称“伏愿陛下申诏诸将,使之相度山川形势……上而川蜀,中而襄汉,下而两淮,凡彼之所必攻而我之所当备……酌其轻重,量其缓急。”又据《宋史·选举志六》称:“方今国家之兵,东至淮海,西至川蜀,殆百余万。”可证。
- ②如王定璋的《四川古代著名史学家》(巴蜀书社2004年)对整个古代四川著名史家作了概括,也涉及到宋代史家如李焘、李心传等人,但该书属于通俗读物,着力于介绍而未予深研;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88年版)涉及到《宋实录》的修纂问题,但未从川蜀地方史角度对其作者进行考察;熊斌、黄博的《以史论政:宋代四川史家的前朝史研究——以范祖禹、李焘为主线的考察》(《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则是与本文较为切近的研究成果,但该文针对四川宋代史家的前朝史研究,而不像本文这样针对四川宋史家的本朝史研究展开论述;邹重华、粟品孝主编的《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四川史学家族多有论述,但未从实录作者的角度予以关注。

参考文献:

- [1]程秘.洛水集[M].明崇祯元年刻本.
[2]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王定璋.四川古代著名史学家[M].成都:巴蜀书社,2004.
[4]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88.
[5]熊斌,黄博.以史论政:宋代四川史家的前朝史研究——以范祖禹、李焘为主线的考察[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
[6]邹重华,粟品孝.等.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7]留正.皇宋中兴两朝圣政[M].清嘉庆宛委别藏刊本.
[8]佚名.宋史全文[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9]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0]曹彦约.经幄管见[M].民国豫章丛书本.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G].北京:中华书局,2004.
[12]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3]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4]王称.东都事略[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5]杨仲良.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清嘉庆宛委别藏刊本.
[16]熊克.中兴小纪[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8]陈骥.南宋馆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9]嵇璜.等.续通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20]袁桷.延祐四明志[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1]佚名.南宋馆阁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2]许应龙.东涧集[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On the Sichuan Author Group of *the Factual Record of Song*

XIE Gui-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253 officials who compiled *the Factual Record of Song*, 44, i.e., around 1/6 of all, are believed to be from Sichuan district. That is a perfect example to prove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Sichuan district in the Song dynasty.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due to the loss of central plains and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Sichuan in national territory, Sichuan provided with more authors to compile *the Factual Record of Song*, whose total number even surpassed those of Zhejiang and Jiangsu. The large number of authors involved in compiling has great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ography families and traditions. There came out such historiography families as the Fans in Huayang, the Lis in Danling and the Gaos of Pujiang. SU Shi of Meishan and LI Xin-chuan of Jingyan are also good examples in authors from Sichuan in compiling *the Factual Record of Song*.

Key words: *the Factual Record of Song*; author group; Shu culture

[责任编辑: 凌兴珍]